

论饶锷国学方法论意识的自觉

闵定庆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 饶锷先生是近世潮州学术大家,毕生致力于“国故学”研究,著作等身,成就斐然。他全盘接受了近代革命家的“新国学”理念与方法,在思想上将国学视为民族复兴、对抗西化的基石,因此“国学”是他思考民族文化命运的起点,更是他所有文化活动的指归。他在国学方法论上则以地方文献整理研究为专业分工细致化的专业标志,秉持学术判断的客观性与事实性依据,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积极运用新型传媒方式促进国学研究,普及国学知识,同时又营造了一个古色古香的生活环境,增进了国学的生活化体验,使国学成为可知可感、生动活泼的文化实体。

关键词: 饶锷; 饶宗颐; 国故; 考据;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I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3)04-0062-07

On Rao E's Self-awareness of Methodology to Study Chinese Ancient Learning

MIN Dingq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Abstract: Mr. RAO E is a great academic master of modern Chaozhou City. He devoted all his life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ancient learning and mad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with many works to his credit. He completely accepted the idea and method of the new sinology of modern revolutionaries, and regarded Chinese ancient learning as the cornerstone to rejuvenate the nation and confront westernization. Accordingly, “sinology”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his reflection on the fate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as well as the intention of his cultural activities. He took local literature researches as the professional signs of the meticulous divisions, upheld the objectivity and factual basis of academic judge and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e used new media to promote the researches of sinology and popularized knowledge of Chinese ancient learning. At the same time he built a kind of living environment with ancient atmosphere, enhanced the living experiences of Chinese ancient learning, and made it become a sensible lively cultural entity.

Key words: RAO E; RAO Zongyi; Chinese ancient learning; textual research; methodology

民国初年的潮州文化氛围,乃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一个“缩影”。当年,韩愈刺潮,越八月而去,开启了潮州“海滨邹鲁”的新纪元,潮人在“韩愈崇拜”氛围中积淀了潮汕地区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底蕴。清

收稿日期: 2013-01-18

作者简介: 闵定庆(1964-),男,江西永修人,文学博士及博士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及文献学。

嘉道年间,阮元督粤,将朴学引入广东,学海堂肄业生温仲和于光绪二十年(1894)回到潮州金山书院任教,送经温仲和、温廷敬、饶锷、宗颐三代人的薪火相传,形成了一个“治朴学如乾嘉时代的考据学一样”的学术群体。^{[1](p1)}1900年前后,翰林吴道镕主潮州韩山书院、金山书院讲席,嗣后京师大学堂首届文科毕业生姚梓芳返潮执教,将“桐城文”引入潮州,潮人出现了“远宗退之而近法桐城”的新变。同时,饶锷、石铭吾、侯节、刘仲英、杨光祖等人主动师事同光巨擘陈衍,“渐事苦吟”,折向宋诗一途。在上述多种合力作用之下,古城潮州出现了一个以饶锷为核心的“新国学”群体。这批年轻的知识精英积极反思潮州文化、传统文化的成就与不足,同时联络京沪宁学界同仁,借鉴最新的学术成果,努力探索古典学术的近代转型,进而寻找个性化的学术表达,先后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作为领军人物的饶锷,无论是在“新国学”群体的组织方面,还是在国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方法的更新等方面,均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因而具备了进行个案研究的意义。^①

饶锷先生(1890—1932)是公认的近现代潮州的学术大家,毕生致力于“国故学”研究,著作等身,在诗文创、地方文献整理、方志撰作等多方面成就斐然。客观地讲,他在从事国学研究的过程中遭遇到的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的家族数代经商,虽富甲一方,“商人”身份毕竟与“国故学”不免有几分疏离感。他早年毕业于上海政法学堂,所学专业也与“国学”相去甚远。而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潮州古城,僻处南海之滨,在文献资料、学术机构、专家学者、治学方法及学术氛围等多方面,都有明显的不足。更为紧要的是,他所处的时代,恰恰是以民主、科学为表征的现代文明重构中国社会体制与价值观的关键期,儒家文明正无奈地退出中国文化中心地带,国学研究已被高度边缘化。但他毅然决然地转向“国学”一途,从事传统学问的研究,重塑自己的文化身份。

纵观饶锷先生的一生,可以发现,“好古”、“嗜古”是他一生文化活动与学术著述的文化底色。可以肯定,以下这三个方面是决定饶锷文化选择的关键因素:一是,潮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及积淀已久的“韩愈崇拜”氛围;二是,经由潮汕地区权威教育机构传承的乾嘉考据学传统;三是,章太炎、高燮、黄节等革命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新国学”运动的影响。这三者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其中,潮州文化语境确能形成某种文化层面的“集体无意识”,在幼小心灵打下深深的文化烙印,但在文化活动与学术研究的操作层面上并无实质性的影响。饶锷早年接受乾嘉考据学的学术规范与操作细则,在治学方法上与清末民初的“新国学”运动基本上是高度一致的,促使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国故整理与研究。

“国学”成为他思考民族文化命运的起点,更是其所有文化活动的指归。饶锷先生早年求学于上海法政学堂,学的是新学,接触的也多是新派学人,与以南社核心人物为主的激进的青年汉族知识分子交往甚密,更将高燮、金天翻等视为平生知己,因而他的研习重心向国学一途倾斜。^②王振泽《饶宗颐先生学术年历简编》也说,饶锷“毕业于上海政法学堂”,“青年时,自觉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1909年,当陈去病、柳亚子、高旭等人在苏州创立文学团体——南社时,他即积极响应”。^{[2](p3)}饶锷在接受他们的革命思想的同时,也全盘接受了他们的“国学”理念。众所周知,章太炎、高燮、黄节等人既是追随孙中山先生排满建国的革命家,又是博览古今、沟通中西的学问家,致力于发掘“国粹”,弘扬“国学”,重建民族精神。他们曾对“国学”的精义作过较系统的论说:第一,“新国学”的倡导是与民族存亡休戚相关的。章太炎《答张季鸾问政书》说:“一,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二,为

^① 关于近世潮州“新国学”群体的个案研究,参见拙文《〈潮州诗萃〉选政初探》(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潮州诗萃〉选政三题》(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2期)、《〈花外集笺注〉与现代词学研究体系的建构》(刊《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石铭吾〈慵石室诗钞〉宋调风神探赜》(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及《“古雅”:饶锷先生的文化心态与审美取向》(刊《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等。

^② 饶宗颐述,胡晓明、李瑞明整理《饶宗颐学述》:“父亲曾是上海法政大学学生,也是南社的成员,他的友人高吹万、金天翻等,也是南社中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页)

救亡计,应政府与人民各自任之,而皆以提倡民族主义之精神为要;三,中国文化无本宜舍弃者,但用之则有缓急耳,今日宜格外阐扬者,曰以儒兼侠。”《〈制言〉发刊宣言》说“今国学所以不振者三:一曰毗陵之学反对古文传记也,二曰南海康氏之徒以史书为账簿也,三曰新学之徒以一切旧籍为不足观也。有是三者,祸几于秦皇焚书矣!”以振兴国学为己任,并引“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自警。^{[3][p144]}高燮则大声疾呼,“国学”乃立国之本,“国而无学,国将立亡。学鲜真知,学又奚益”,同时指出,国学是具体可感的,“国学莫先于儒术,而儒术之真莫备乎孔学”,“孔学之真”在于五伦相提并举,“一皆无所偏倚”,崇尚真知,“多与西哲之言相合”。^{[4][p14]}第二,重估与整合“国故”范畴,如章太炎《馗书》说“夷六艺于古史”、邓实《古学复兴论》言“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之学亦国学也”,这就将经学、子学、史学、文学、小学等学科全部纳入“国故学”的范畴,进而在此基础上展开学术史批评,“正虚妄,审向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孔氏”,考据与义理并举,发明甚多,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学术范型。^①第三,以“国故”为民族复兴的基石。1905年,邓实《古学复兴论》说“吾人今日对于祖国之责任,唯当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见种种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学之声价,是则吾学者之光也……安见欧洲古学复兴于15世纪,而亚洲古学不复兴于20世纪也。呜呼!是则所谓古学之复兴者矣。”自此以后,人们从欧洲文艺复兴的高度来证立“古学复兴论”,呈现出相当自觉的文化转型意识,如章太炎《革命之道德》说“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刘师培《拟设国粹学堂启(并简章)》说“二十世纪为中国古学复兴时代,盖无难矣,岂不盛乎!”因此,辛亥革命之后,原先那股仇视满族政权的思潮出现了整体性的消退,章太炎、黄侃、高燮、柳亚子、黄节等人返回书斋,整理国故,实现了汉族知识分子自我文化身份的认知。

这里,还要进一步考察介乎师友之间的高燮,在饶锷国学道路的选择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在“清运既终,专制随倒,共和初建”的关键时刻,民国政体不可逆转地朝着西方“民主”政体方向急速发展,“科学”教育体系也随之全面展开,“国学”、“孔教”并未如“国粹派”、“新国学”运动健将们期望的那样被树立为“国本”。高燮将横书的西方文字诋为“蟹行”,讥西方文献为二道贩子的“象胥之籍”,更将最高教育当局主持者划归“新学之徒”一流,指责他们借口“政体变更,国教不合”,“不尚有旧,视典籍如直土”,从“国家意志”高度强行推进西式教育,以至于“户肆蟹行之文,家习象胥之籍”,因而担心国学与孔学“不亡于暴秦,不亡于盗贼夷狄,而将亡于神明华夏主持教育者之手”,于是大声呼吁有识之士回归中华文化。1912年6月30日,高燮连同姚光、高旭、蔡守、叶楚傖、柳亚子、李叔同等南社社友发起成立“国学商兑会”,会址设在高燮的闲闲山庄,倡导“扶持国故、交换旧闻、讨论学术、发明文艺”,以期“共采中原之菽”,“聊示绝学于一线”。^{[4][p15]}高燮藏书逾30余万册,刊《国学丛选》,后又结寒隐社,编《寒隐庐丛书》,修《金山县志》。同时,高燮致力于家乡公益事业,在浚河、修桥、铺路、筑堤、兴学等方面贡献良多。经饶锷联系,高燮与潮州学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对饶锷所创的“瀛社”、蔡竹铭所创的“壶社”及郭辅庭所创的“乐善社”给予大力支持,又为郭辅庭的《天乐鸣空集》、蔡儒兰的《南国吟草》等作序,奖掖有加。

饶锷与这位恩师保持着密切联系,及时了解国内“国学”活动的近况及动向,产生强烈的思想共鸣,起而效法,也在潮州组织社团,办报出刊,整理文献。这样一来,以高燮为代表的“新国学”理念深深沁入饶锷的心田,尤其是国学商兑会的运作模式与学术旨趣,对饶锷的国学研究极具启发意义。可以说,饶锷对于“国学”价值的重估,对于国故的整理与研究,无处不闪现着高燮国学理念的影子。

①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说“清初的诸子学,不过是经学的一种附属品,一种参考书。不料后来的学者,越研究子书,越觉得子书有价值。故孙星衍、王念孙、王引之、顾广圻、俞樾诸人,对于经书与子书,简直没有上下轻重和正道异端的分别了。到了最近世,如孙诒让、章炳麟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发明诸子学。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到此时代,竟成专门学。一般普通学者崇拜子书,也往往过于儒书。岂但是‘附庸蔚为大国’,简直是‘婢作夫人’了”,“到章太炎方才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外,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太炎的《原道》、《原名》、《明见》、《原墨》、《订孔》、《原法》、《齐物论释》都属于贯通的一类。《原名》、《明见》、《齐物论释》三篇,更为空前的杰作。”

二

饶锷从深层次感知并把握住了辛亥前后时局变化与文化转型的历史动向,与南社成员的普遍认知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追求“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职志的“种族革命”,投身以中华文化本位论为核心的国粹保存运动。这一“反清攘夷”的心路历程,可从一些诗文中得到较深层次的映证,《冯素秋女士传》就描写了冯素秋女士深受秋瑾女士的精神感召:“当清之季世,士怀故国,海宇骚然,其间以女子以浙产,侨居潮州,读其书,颇跼之,慨然以继起廓清自任,密与其戚卢君青海规划革命方略甚悉。会武昌首义,清帝逊位,女士闻之,跃然大喜,夙愿既售,则退而温习故籍。”^{[5](p116)}在这位英气逼人的女子身上,映射出了作者自己相类似的“英雄情结”——出则救国救民,退则温习故籍。清帝逊位,民国肇建,这一命题自然消失,因而进退之间挥洒自如。这样设置历史情境,源自革命党人以汉族为中心的“国族意识”。章太炎曾建议应在传统的《春秋》大义、晚明抗清志士及“进化论”思想这三点上建构现代意义上的“国族意识”从“进化论”的角度看,汉、满各为一族,满族虽最后同化于汉族,始终是有主次之分的,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所言“《春秋》之所谓夷,皆五帝三王之裔也”、“满洲蒙古,皆吾同种”的汉、满、蒙合一的“混同族”绝不可信,所谓“文野之分”、“华夷之辨”始终存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目标一旦成功,汉族必将重新占据政治文化主导地位。^①

因此,饶锷进入民国之后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一,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显得很温和了。作为儒家信徒,饶锷终其一生都在践履“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理念,尽管在《菴园记》中声称“其于为天下、国家,固非吾今者之事也,而修身、养气、强勉问学,则敢不惟日孜孜”,亦即在“种族革命”成功之后,不再奢望事功,而致力于“国学”研究,立足于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最低层次的“立言”,奉献扎实可信的研究成果,将陈子龙、顾炎武“以学正心”、“以学救国”的经世致用之学付诸实践,试图从根本上改造与重铸中国文化。其二,采取个体阐释的方式区别对待满族文化。就具体例子而言,他的《奉天清宫古藏目录序》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一转变,该文虽用“满清入主中夏”的话语,以严分汉、满之别,但是,他并不像革命党人那样将清末社会风气隳坏、道德沦亡、政务不良诸多弊端,全归咎于满族的“落后文化”与“野蛮施政”,反而以较客观的语气评述清前期“二百余年,累世稽古右文”,“海宇承平,民物安乐”。^{[5](p32)}他进而认为清史的转折出现在慈禧太后执政之后,其《慈禧宫词百首并序》用很大的篇幅全面清算慈禧的种种败政劣迹,指出慈禧“益事奢华”,颠预干政,终致“清室陵夷,声威扫地”。

与此同时,在饶锷看来,复兴“国学”还可以应对现代西学的挑战。饶锷作于1930年的《白香山有移家入新宅诗,余构菴园落成移家其间,即用白诗题五字为韵作五首》,有一句近乎“诗界革命”派式的句子:“西儒故有言,‘物竞斯天择。’”^{[5](p137)}这里,重复26年前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物竞天择”的“社会公理”,可见他仍处在过往的“竞争/自强”语境框架之内。他认为,来自西方的竞争应区分为正、反两个面向。正面的要素应充分肯定,如《冯素秋女士传》就女权问题发表了全新的见解:“嗟乎!吾国女权不振垂四千年矣!古传所称女子懿德,大抵皆偏重于家政、伦常,其有涉书史、干外事者则世以为大悖。自欧风东渐,往时妇德之说稍稍撤其藩篱,然娼媵淫荡者又扇于自由恋爱,时有越轨踰闲之事,守旧之徒群起诋击,至归咎于女学之不宜兴。”^{[5](p116)}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女性就没有得到足够尊重,确由西方女权思想的激荡方开风气。但是,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构成了“此消彼长”型的文化生态,中国文化面临着“陆沉真可俟”的境况。饶宗颐在谈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也说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思潮很多,非常矛盾”,“那个时代西化的倾向太浓厚,把本位文化压得很低”。^{[6](p77)}因此,饶锷《复温丹铭先生书》说“方今国学陵夷,炎黄文武之道不绝如缕。”^{[5](p71)}《柯季鸷诗集序》说“余少时为诗,是时海内

① 例如,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说,自幼嗜读《春秋》左氏传,又喜南宋郑思肖、明末王夫之书,“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什麼学理。自从甲午战争之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进化论等)学理收拾进来”。(《章太炎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88页)

学者方醉心欧化,绝学岌岌日就湮微,欲求一二非常奇特之士相与切劘砥砺,卒不可得。”^{[5](p35)}《昼锦堂诗集序》说“夫当兹世衰学废、彝伦道丧之余,而有人焉能励名行自约束于规矩,已自可贵。”^{[5](p28)}指出欧风美雨正盛之时,传统文化岌岌可危,国家已无全面复兴国学的可能,只能寄希望于有识之士,每个人恪尽职守,弘扬国粹,接续绝学。当然,我们还须注意,饶锷对西学的认识出现了某些偏差,如《高先生合家欢图后记》说“方今士务外学,嗜尚新奇”,“谬妄之徒至欲持独身而废家族”。^{[5](p91)}将爱情自由、婚姻自主、个人独立等“西学/现代性”品格斥为“谬妄”,固然有其时代局限性,但其中蕴藏的忧患意识与本体意识,无疑是极其深重的。

有鉴于此,饶锷认识到,相对于“种族革命”的阶段性与具体性而言,回应“西学/现代性”的挑战,实际上是长期性的、深层次的。如要坚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回归到“文化本体”的高度,再与“西学/现代性”进行平等对话,无疑也存在着相当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饶锷毕竟是旧学阵营走过来的,无法从新世界中找到相应的思想学说的“支援”,只能重返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带,以发掘文化重生、文化对话的思想资源与方法论资源。因此,饶锷的“国学”理念聚焦在以下三点上:

第一,坚守“纲常”信念,发挥日常人伦特有的“固本培元”作用。饶锷认为,由于日常人伦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天然的,彼此间的依存度极高,反过来,这一理念必须在日常人伦的活动中体现出来。由此推衍,儒家“三纲五常”理论及其相应的仪轨制度,是通过庄重肃穆的祭拜仪式、典雅严谨的谱系编撰,昭示宇宙自然秩序的存在感,以确证各种人伦关系的客观性、传统政治制度的权威性与道德情感的永恒性。

其次,弘扬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发展事功经济。饶锷一再教导晚辈毋沉溺于雕虫小技的诗文书画,《南园吟草序》说“吾谓亦其处境使然也”,“转而努力于事功经济,则所造诘可限量?顾乃散精神于雕虫小技,抑亦未矣。”^{[5](p30)}这番肺腑之言,不仅仅体现了长辈的关切之情,更重要的是来自人生阅历与苦难的升华与提炼,是在思想认识上对于陈子龙、顾炎武、章太炎、高燮等人经世致用之学的效法。

第三,刻苦治学,以严谨、纯正的考据学再现“国学”精蕴。郑国藩《饶锷墓志铭》称饶锷“生富家,无纨绔习性,独好古,于书无所不窥,尤致力考据之学”。饶锷自己更有“入世卅年,涉世卅年,玩世廿年,世味饱经,老去厌谈天下事;藏书万卷,读书千卷,著书百卷,书生结习,闲来学种武侯瓜”的“名山事业”期许。^{[5](p181)}显然,他已将国学视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慧命”,从“自强保种”出发,固守本土文化,凸显了当时知识分子“学能救国”的理念,在精神层面上与世纪之初知识分子倡导的“科学救国”的理念,确有暗合之处,也不无理想主义色彩。其师高燮《答饶纯钩书》称誉饶锷“奋志南天,中流一柱,学能救国,其道斯宏”,形象地揭示出了饶学的深层意蕴。^{[5](p183)}

三

在“新国学”理念的影响下,饶锷走上了“向内转”的“国学”路子,将“新国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具体的“国学”活动之中,并在潮州城古趣盎然的生活情调与文化氛围中,选择较为纯粹的区域性文化行为模式与生活方式,再现“古雅”的生活情调,以凸显“文化本色论”的取向。

就“国学”的物化形态而言,古籍文献是最直接的物质载体。因此,在藏书、读书与著述等方面,饶锷投注了全副的身心。他性喜收藏古书,近十万卷的古籍成了一种极其优雅的“逃避藪”。饶锷在《书巢》中标榜自己耽书有如“痴淫之癖”:“吾室之内,或栖于椽,或陈于几,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病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5](p88)}《亡妻蔡孺人墓志铭》更对自己的这一行为及其文化心态有所揭示:“余既以迂拙不能趋时合变,赴势利之会,攫取富贵,居恒读书自乐。”^{[5](p113)}这批藏书构成了他的“国学”知识体系建构与认知的基础,所以,他对儒、释、道经典的取态是非常鲜明的,即信奉儒学,而于佛道基本上是存而不论的。他在为好友蔡梦蝶《心经述义》作序时,一方面体悟好友的人生遭遇与生命体悟,理解好友奉佛的选择;另一方面,却借程子“万变皆在人,其实无一事”的话头,巧妙表达了对于佛学的态度。因此,他所关注、讨论的典籍,多为儒家经典和纯学术著作。他也并

不因性情之所近而在“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之间随意挥洒,而是以乾嘉考据学的写作范式作为文献阐释与揭示的“标杆”,体现了朴茂渊雅,不事雕饰,节制有度,逻辑性强等特点。

在文献揭示方面,饶锬持冷静、客观、公正的态度。他作《南疆逸史》跋文,完整叙述了此书的撰作与传播过程,指出在晚清时期被汉族知识分子用以宣传“排满”革命思想,名噪一时,不过是机缘巧合而已。饶文并没有从民族民主革命的高度来称赞此书,反而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提出,要匡补此书的错误,目前所见百余则补正的材料就是明证。他在《永乐大典目录跋》中叙述了《永乐大典》及目录的散佚经过,从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两个方面探讨《永乐大典》“尽付劫灰”的缘由,全面、客观、可信。可见,饶锬不喜“过度阐释”,能将文献释读从政治策略的框架内释放出来,实现了文献理解的自主性诉求,体现了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

在文献著述方面,饶锬追摩孔子“述而不作”的故辙,致力于文献编撰与整理。郑国藩《饶锬墓志铭》罗列其著述如下:“平生著作付梓者,《慈禧宫词》一卷、《西湖山志》一卷、《饶氏家谱》八卷;未付梓者,《王右军年谱》一卷、《法显〈佛国志〉疏证》十卷;属草稿未完者,《亲属记补注》、《潮雅》、《〈淮南子〉斟证》、《汉儒学案》先成《易学》一卷、《清儒学案》先成目录、凡例四卷,续章学诚《校讎通义》、李元度《先正事略》则有目无书,皆有志未逮也”,“近十年来留心乡邦文献,拟编《潮州艺文志》,自明以上皆脱稿,有清一代仅定书目,而君已疾矣。”^{[5][p154]} 这等身的著作,全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学”论著,对于纯粹的学术问题,尤其是原创性话题,表现出极大的自信与极强的担当。所以,这一系列著述,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每一个专题都是值得深入发掘的“富矿”。更重要的是,他在“述而不作”的基础上奉行“信而有征”的编撰方法,即最大限度收集、整合文献,将有关原文资料加以排比、编次,再现历史的原生态和事物的本真面目。尤其是在地方文献方面,他有着一种时不我待的急切感与焦灼感,他在《与蔡纫秋书》中说“居今之世而言整理国故,途径虽不一端而一邑当务之急则莫先于徵文与考献,其在吾潮尤不容或缓者也”,“方今世变日亟,乡献剩篇不绝如缕。”^{[5][p61]} 于是,搜讨文献,数月而成《西湖志》十卷;又模仿孙诒让《温州经籍志》而撰皇皇巨著《潮州艺文志》。这些文献的编就,于地方文献撰例多所发明,有着发凡起例的转型意义。以地方文献整理研究为专业分工细致化的专业标志,秉持学术判断的客观性与事实性依据,从而获得接近于“中性”言说的自由,故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创造出学术奇迹。他将考据学升华为“国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论,以客观而周密的研究过程,再现历史真实,体现了高度的理性精神。这在客观上已非常接近当时学界奉行的“科学精神”了。

饶锬尝试办报出刊,以近代学术传播方式,拓展国学研究与普及的新渠道。青年饶锬受南社师友影响,服膺民族主义革命,王振泽《饶宗颐先生学术年历简编》说,饶锬“青年时,自觉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学成后返回潮州,曾任《粤南报》主笔”,开潮州风气之先,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1924年,饶锬创办《国故》月刊,以振兴国学为职志,广泛联系海内学界耆宿,征集“国故学”稿件,其师温廷敬《赠饶君纯钧并序》就说“纯钧,余分教同文学堂时学生也。近数年来,见其所作古文辞,深含义法。今岁以创《国故》月刊,故来书通问。”^{[5][p178]} 办报出刊,能够积极运用现代传媒方式进行适时的“国故学”反思与整理,无疑是一种时代感极强的文化普及与传播活动,更是实现“国故学”现代转型的有益尝试,是架通古典文化与现代文明的重要桥梁。

饶锬还成功建构了一种古色古香的生活样态,创造古雅的生活情调,在精神气质层面接近“国学”的情境。他在潮州城内营造一个诗意栖居的所在,造园林、建亭榭、引曲水、植竹木,在喧闹的都市里另辟一方洞天,从而产生典型的士大夫式的“移情效应”。己巳十一月,饶锬构天啸楼落成。这是一座二层洋楼,却挂上了“天啸楼”的匾额,屋内满壁都是字画,赋予这座新楼特殊的文化内涵。饶锬作《天啸楼记》回答友人“天啸楼”命名之由,说出了一番欧阳修《秋声赋》式的话“夫风,天之声也”,“凡自然之声谓之声,不平之声谓之啸。余穷于世久矣,动与时乖违,外动于物,内感诸心,情迫时辄为不平之鸣,而一于文辞诗歌焉发之,故吾之为文与诗纵怀直吐,不循阡陌,愁思之音多,盛世之辞寡。是虽生际乱世使然,宁非天之啸歔?”^{[5][p87]} 通过士大夫式的感慨,消解近代化语境中的种种“不适”与“不快”。接着,他

在天啸楼下不足一亩的隙地造“菴园”，“树焉、石焉、池焉、桥焉、亭焉、榭焉”，流水环榭，修廊曲折，悠游于此，得俯仰从容之乐。^{[5] [p85]} 他喜欢在自家园林款待文友，诗酒唱和，仿佛将时光拉回古人的情境之中。浓郁的古典情调，消弭了天啸楼的现代气息。

在诗文创作上，饶锷振衰起弊，对于扭转潮州地区诗风、文风、学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作诗崇尚江西派，为文遵奉桐城派，法度森严。他与侯节、刘仲英、杨光祖、石铭吾、黄仲琴、康晓峰、詹安泰等一批年轻诗人，自觉地盛唐摹古之风、随园滑易之习中挣脱出来，私淑“同光体”魁杰陈衍，“渐事苦吟”，结“壬社”以团结诗坛同人，自任第一任社长。潮汕诗坛终于打破了石铭吾所厌鄙的“韩江一水西江隔，从来诗派欠陈黄”的窘境，初步显现了“挹取西江水一勺，涪翁之外后山翁”的盛况。^{[7] [p51]} 饶锷《壬社序》说：“近日邑子之能诗者颺起云涌，其盛犹不减于曩时。于是，辜君师陶、杨君光祖等以为不可不集，遂纠同志发起为是社，爰于壬申元日觴集于菴园盟鸥榭。时来会者十六人，而余以园之主人，谬以承推引，亦获躬与其盛。酒半酣，群商名社，或以某名最宜，或以名当为某，而卒因社始于壬申，定名曰‘壬’。”饶锷宗向欧阳修、归有光、戴名世之文，针对潮人“尸祝”韩公“决以得失，卜以吉凶”、学韩文却“学无渊源，志趣不大”二弊，大力宣传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三点论，以扩宽潮人的视野，升华潮人的心性，“告以作文之道，申以义法”，光大“昌黎之学”，在文学创作上争取“与中原相角逐”。

饶锷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典型的“文化遗民”，《四十小影自题》形容自己“既遭时之不幸，乃息迹乎海垠。抱丛残以补佚，将闭户而草《玄》”，自己实实在在是一个“遗世以全我真”的人，并非寻常意义上的“殷之夷”、“鲁之连”。^{[5] [p130]} 他毕生致力于保存国粹、振兴国学，一方面勤于著述，创造了许多学术奇迹；另一方面，积极办刊、出书、结社，团结潮汕学人，凝聚了一个地域特色鲜明的“古学”群体。这一系列“国故学”活动，表现出一个学者应有的自觉意识。从中国古典学术的创造精神切入赓续传统，回应西学的挑战，这是饶锷面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困局开出的一剂药方，充分体现了近代文化转型期本土知识分子特有的思想深度与方法论意识。

参考文献：

- [1] 蔡起贤. “潮州学派”的形成及其影响[A]. 蔡起贤. 缶庵论潮文集[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 [2] 王振泽. 饶宗颐先生学术年历简编[M]. 香港: 艺苑出版社, 2001.
- [3] 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四)[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4] 高 燮. 高燮集[M]. 高 钰, 高 铨, 谷文娟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5] 饶 锷. 饶锷文集[M]. 陈贤武, 黄继澍整理. 香港: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2010.
- [6] 胡晓明. 饶宗颐学记[M]. 香港: 商务印书馆, 1996.
- [7] 石铭吾. 慵石室诗钞[M]. 赵松元, 杨树彬校注. 北京: 线装书局, 2008.

(责任编辑: 张立荣)